

“年味”逐渐消失的哲学本质及其时代应对

贺胤杰

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福建厦门, 361021;

摘要: 中国农历新年“年味”逐渐消失的哲学本质是美好生活的集中展现, 分为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与消费, 以及家庭情感集中体验这两个方面。现代社会的进步性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年味”的历史基础, 对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异化消解了“年味”的经济基础, 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消解了“年味”的社会基础。要挽救逐渐消失的“年味”, 我国应尽全力恢复国内经济发展活力为扬弃人的异化提供物质基础, 积极推进农历新年文化传播与创新形式与时俱进从而有针对性地保留与创造“年味”, 以及关注社会和谐问题从而奠定“年味”能够顺利生发的社会主旋律, 更要进一步在共产主义理论视域中实现“年味”的扬弃。

关键词: 年味; 农历新年; 两个结合; 异化; 现代性

DOI: 10.64216/3080-1486.26.01.057

所谓“年味”, 指的是中国农历新年所独有的一种节日蕴味。中国农历新年由一系列历史悠久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组成, 且在华夏大地的不同地方有着各式各样的差别。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农历新年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都占据着独特的位置, 都有着对“年味”的独特印象。可是, 近年来, 中国社会愈发生生出一种对这一传统意识形态的异变感, 那就是曾经令我们流连忘返的“年味”, 竟然在逐渐消失, 人们普遍能感受到的农历新年节日气氛逐年减少, 以至于人们也越来越不像过去那般高度盼望农历新年的到来。绵延上千年的农历新年优秀传统文化, 面临着严重的传承危机。在新时代的中国, 特别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背景下,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农历新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同当下“年味”逐渐消失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特别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探寻“年味”本身的内涵, 以及其逐渐消失这一现象的本质和真正原因, 同时以“年味”这一中国特色意识形态为切入点,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 中国农历新年的“年味”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集中展现

人们对“年味”最常见的印象大多集中于: 农历新年是一个人与他的家人在一年中难得能够团聚并共同享受相对他个人及其家庭条件而言的最奢侈生活的一

段节日时光。恩格斯指出: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 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 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 即种的繁衍。”^{[1]13} “年味”作为一种人们意识中的思想观念, “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152}, 归根到底是对“两种生产”现实生活过程与状况的思想反映, 即对生产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集中消费升级, 和对伴随人自身的生产而派生出的家庭情感的集中体验; 而这两点总结起来, 正是人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普遍样貌, 揭示出“年味”的哲学本质是我国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愿望在农历新年时节的集中展现。

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们首先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以供消费, 于是“年味”就包括了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与消费的方面。马克思指出: “生产直接是消费, 消费直接是生产。”^{[3]691} 生产消费了人的生命力, 而消费再生产了人的生命; 生产创造出消费的对象材料, 消费创造出生产的主体需要。在日常衣食住行之外, 经过一整年的生产劳作, 人们总是需要对这一年所生产积攒的物质生活资料进行年度性集中消费享用。虽然中华文化有着许多传统节日, 每个节日所对应的特色民俗文化也都具有能一定程度提高物质享受水平的性质, 但农历新年作为最重大的节日, 不仅民俗活动涵盖的时间往往包

含农历腊月和正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对物质享受水平的提高程度也往往是最大的。对于个人及其家庭而言,出于个体更辛勤的工作,甚至是国家社会整体发展前景向好,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往往能够使其产生长期的生产与消费升级;而在一些特定的或偶然的较短时间,也会产生短期的生产与消费升级——农历新年“年味”的生产与消费升级相比于一年中的其他时间而言可能是中国这个历史悠久、规模庞大、构成复杂的国家中的人们产生短期升级最稳定的时间之一。同时,“年味”也具有一定的长期升级性质:农历新年节日气氛带来的高涨情绪通常是一个适合个人及其家庭产生长期消费升级转向的时间节点;对于当代中国人民来说,每个农历新年除夕夜晚在电视上播出的《春节联欢晚会》是给几代中国人留下无数美好回忆的重磅节目,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的众多经典桥段能达到让十几亿中国人民传唱至今的庞大规模,地方电视台的同类春晚节目也在逐年欣欣向荣,春晚早已成为农历新年“年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无疑是逐步迈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长期升级。

不仅出于动物性本能,也为了更好地维系与促进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们往往将良好的家庭关系与亲情体验纳入美好生活的理想样貌范围,于是“年味”就包括了家庭情感集中体验的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2]161}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归根结底是为能够满足人的迫切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服务的,而组织生产客观地要求分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转引《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的一句话指出:“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1]76}可见,家庭关系是社会生产最基本的分工形式,是实现美好生活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形式之一,以至于这种关系早已成为美好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因此,农历新年的“年味”尤为强调家庭关系的维系与和睦,甚至十分有必要为此进行专门的消费升级:对于身在他乡的人们和他们故乡家中的亲人,春运返乡所需较昂贵的交通费用及其可能占用的工

作时间作为必要的消费升级行为前提也成为了“年味”重要的组成部分。

“年味”不只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产物,而是源于古老的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中国农历新年的历史渊源十分悠久,最早可追溯至上古时期。虽然每年“新年”的具体时间及其习俗规定在几千年的华夏文明赓续中不断变化、丰富,但基本都设立在四季之中冬去春来的那段时间;近代以来我国将农历新年的第一天逐渐称作“春节”,显然正是这一体现。作为中国传统农历规定的新年“年味”显然与产生传统农历并由农历长期指导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年度周期直接相关,农历新年是在长期处于农耕文明生产方式为主的中国历史中逐步发展形成的,因此物质生活资料消费升级的“年味”也自然是由农业生产方式所生产出的产品直接决定的。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形式,即小农经济,生产至消费的环节很短、规模很小,生产以家庭为主要单位,以对家庭自给自足的生产产品直接消费为主,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分配环节也主要在家庭内部以及农民与地主之间较简单地进行,交换环节只有较小规模的定期集市商品经济。在这样的条件下,“年味”就主要体现为传统家庭生产的年度剩余产品的直接消费升级,同时也就是生产或劳动力再生产的升级。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农业社会的劳动者及其家庭往往在冬季才拥有了能进行相比平时较为奢侈享受的物质基础条件,即粮食等农作物及农副产品收成;同时冬季进入农闲时间,农业劳动者才有空闲时间进行一定享受性的消费升级行为。农业社会的商品经济交换时间往往集中发生在农历新年时节的“庙会”“赶集”等带有民俗色彩的经济活动中,也是因为在冬季时农业劳动者才更可能有剩余产品进行交易买卖。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等剥削阶级向佃农等被剥削阶级收取粮税等剩余产品也往往将时间定在农历新年时节,因此从前也有“过年关”的说法,后逐渐演变为如今人们常说的“过年”。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分工方式为主,社会形式相当程度地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4]52}的历史阶段,以家族血缘关系的轴心凝聚起来的人口的社会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维系熟人的、情感的、亲情的社会关系十分利好农耕生产的稳定与发展繁荣。总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2}，中国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存在决定了我国人民群众在农历新年所处的冬春之交产生“年味”的意识，即生活按照美好愿景的集中展现；同时，当中国逐渐脱离传统社会的历史阶段而走向工业化、商业化、现代化社会，“年味”的逐渐消失便成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2 “年味”逐渐消失的根本原因是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

中国逐渐迈向现代化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形式也愈发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4]52}的历史阶段。现代化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工业科技为生产与消费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好处；但与此同时正如马克思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

⁵¹现代社会对物的依赖导致本应由人所支配的物越来越反过来支配了人，人的愿望越来越被物的愿望所取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为物的增殖让位。

首先，应辩证考察现代社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405}，不可否认现代社会为发展生产力而造成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即异化——这一必然历史过程，对美好生活的实现具有进步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年味”中一部分过时的历史基础。农业是“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即便是有若干农业科学技术加持下的现代种植业的农业产品生产，大多数情况下也无法摆脱春播秋收的自然季节规律。在古代指导农业生产的、与季节和天气相关的华夏劳动人民智慧，如二十四节气、民谚俗语等，在现代农业生产中仍然大有裨益。但纯粹工业生产的产品就其本身来说基本与四季更替的自然气候变化无关。一辆汽车、一部手机无论出厂于夏季还是冬季都不会有任何区别；即便有三峡大坝这样的大型水力发电站在冬季的发电量会明显减少的例子，也完全可以通过适当发展火力发电等随时弥补，火电所需的煤

矿、石油、天然气的开采、运输显然与季节基本无关。因此，相比集中在冬春之交时节产出剩余产品的种植业农业生产方式来说，工业生产方式产出剩余产品的量与季节关系已大幅减小。而正如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222}，工业生产方式的高效劳动生产率所生产出的大量剩余产品逐渐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被人们称作“资本”的东西。相比传统农耕社会羸弱的商品经济只能交换低下的生产力产出十分有限的剩余产品，工业资本社会“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5]217-218}。因此，工业资本社会为了“所谋求的无休止的价值增殖”^{[5]179}，自然要求全年生产、全年创收，剩余产品也就不会明显集中在冬春之交季节产出。与现代中国社会工业生产方式同步发展还有城市化，同时由于中国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便于通航全球交通运输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发展程度相比其他地区可谓独树一帜，也使中国城市化发展与人口流动格局等呈现显著的南北方地区差异。越来越多背井离乡的人们来到与自己熟悉的成长环境、文化环境差异显著的地方，“年味”的历史传承也就越来越容易被遗忘，失去深厚历史渊源的“年味”自然很难与过去相提并论。总之，农历新年的“年味”所以能产生的历史性基础条件遭到了釜底抽薪。

其次，现代社会对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这四大经济环节的异化消解了“年味”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指出：“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3]689}在小农经济的传统中国社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距离很短，分配与交换环节在经济运转环节中占有的比例很小，传统“年味”原本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就体现在生产与消费越来越分离，分配与交换环节越来越重要且复杂。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典型开端的现代社会的两大特征，即劳动力成为商品和以生产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为主，正使得人的异化从分配和交换的中间环节以私有财产为轴心逐渐滋生出来，进而扩展至生产和消费两端，最终将四大环节全部异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做出精妙的讽刺性比喻——“生产过剩的瘟疫”^{[2]406}现象，

即便在当今天依旧泛滥猖獗。无论民间商家还是官方政府，都已经若干年竭尽全力地鼓励消费，相比传统社会在农历新年时节的短期消费升级，如今的消费升级鼓励恨不得在全年的任何一天、每分每秒都见缝插针。虽然承袭文化惯例，劳动者收入仍普遍有“年终奖金”等之类的时间性现象，但相比传统农业社会剩余产品往往保持具体产品如粮食的形式，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分配往往采用货币的形式，货币相比产品尤其是农产品更便于贮藏——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社会，“年味”与货币储蓄率就更趋于呈现出反比关系，近年来我国民间愈发普遍地产生出消费降级的社会意愿。对消费的鼓励越大张旗鼓、越毫不掩饰，就越能映衬出民间自发的消费降级意愿有多么强烈。消费降级意愿的产生与我国经济大环境呈现瓶颈期态势直接相关。一方面，我国历经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时代红利，特别是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耗见底。我国经济已经面临不得不改革整体发展模式，进行系统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6]，产业转型往往难免阵痛期。比如人工智能基本已成公认的赋能产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正像“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今天我们已然大踏步迈向“人工智能时代”；然而也正像18世纪的珍妮纺纱机导致纺织工人失业，人工智能也已经导致收银员、司机、文案作者、原画师等职业从业者遭到大规模淘汰，并让越来越多的职业岌岌可危。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制造”逐渐转向“中国创造”，我国愈发走向全球产业链上游的趋势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敌视。原本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愈发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西方国家长期以国界线替代阶级界线，在全球化中剥削我国劳动者并在其本国内大兴福利国家制度，从而将国内阶级矛盾向外转移的做法愈发行不通了。囿于霸权主义、冷战思维，西方国家连年高筑贸易壁垒，大搞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也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不小的挑战。同时，经济状况的疲软也促使人们更容易接受反消费主义思潮，如“符号消费社会”“景观社会”等消费主义批判；包括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思想，也让人们更加认清资本社

会的实质，愈发不愿意充当“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这一“商品的惊险的跳跃”^{[3]137}的工具。

再次，现代社会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消解了“年味”的社会基础，与农历新年紧密关联的传统血缘亲属关系丧失了现实意义。由于大河文明、农耕文明导致重农抑商的定居生活习惯，自古以来中华文化都十分重视血缘亲属关系。如前文所论，传统中国家庭的血缘亲属之间联系相当紧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农历新年的“年味”上，比如以相当规模的人口数量为一整个家庭在新年时节的“阖家团圆”，以及与在其他民族文化看来相当疏远的亲属家庭相互登门“拜年”的习俗。然而正如恩格斯指出：“当家庭继续发展的时候，亲属制度却僵化起来；当后者以习惯的方式继续存在的时候，家庭却已经超过它了”^{[1]38}，由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愈发工业化、商业化、现代化，特别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或劳动力”成为一种“独特的商品”，从而令他们“自由得一无所有”^{[3]164}，也就让他们不得不在偌大的中国大地乃至全世界到处“流通”，客观的地理空间间隔导致原本传统中国家庭紧密的血缘亲属关系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受到冲击，进而逐渐消解。尽管每年一次或若干年一次，当今中国的人们“以习惯的方式”与自己自然属性上的血缘亲属“团圆”或相互拜访，但在自己的社会属性上——在当代年轻人那里尤为明显——面对实际上从未交往过的陌生人，只是在行为、言语等表象上相互饰演某种虚假的社会关系……血缘亲情意义上的“年味”自然也就随着亲属关系的僵化、淡漠和消解而逐渐消失了。在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将传统的熟人社会日益变更为了现在的生人社会，使得传统的家庭关系日益转化为现代的职业关系，这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本质相关。正如马克思指出：“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2]58}人与人的关系逐渐丧失了本真的、美好的亲情、友情、爱情，而异化成所谓“人脉资源”乃至“摇钱树”，以及嫉妒、焦虑之类负面情绪滋生的源头，等等。现代生产把传统社会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实惠让位给了交换价值的生产偏好，使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了，将传统的熟人的、情感的、亲情的社会关系让位给了现代的生人的、职业的、异化的、价值关系

和利益关系。

3 如何挽救逐渐消失的“年味”

农历新年的独特底蕴毕竟是炎黄子孙难以割舍的情怀,其中丰富的民俗文化所展现出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沧桑,是我们应当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对我国树立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等具有重大意义。说到底,传统“年味”产生于传统中国社会,传统“年味”也随着传统社会形式的逐渐消失而消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现代化社会的异化作用下被逐渐淹没,但这并不一定就代表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不能再造新“年味”,扬弃异化劳动从而让劳动者成为财富与社会关系的主人,重燃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热情。

从普遍性的方面来看,我国应尽全力恢复国内经济发展活力,既要积极探索与引导新兴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还要重点关注与人民美好生活直接相关的民生问题。“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7],我国应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人口发展等多方面不遗余力地积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让人民群众有钱消费、敢于消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改革有阵痛,但不改革就是长痛”,全面深化改革势在必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必须要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应尽快引导低端产业产能向以高科技制造业为首的高端产业转型过渡。一方面,我国应继续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并积极引导其坚持科研创新工作,脚踏实地为国效力。另一方面,对于受到产业转型阵痛期影响的群体,国家有义务和责任帮扶并引导他们顺利过渡至新兴产业,比如对曾经主要从事较传统产业的劳动者进行免费培训,并建立更为便捷的劳动者与新兴产业企业的职聘平台。同时,国家应积极保障劳动者权益。一个社会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同时也是主要的消费者,正如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3]723},劳动者如果没有足够的薪水酬劳,以及合理的工作和休息时间,又何谈刺激消费,何谈消费升级,更何谈让人民群众有余裕享受节日、挽救“年味”呢?“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

^{[5]311},我国应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破除资本逻辑限制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比如国务院发布“2025年元旦不调休、春节和劳动节各增加一天假日”的决定,表明我国政府已注意到社会舆论多年来关注的现实问题,做出了为人民群众谋福祉的积极探索。另外,在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时代,我国也必须时刻警惕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威胁的外部挑战。

从特殊性的方面来看,我国上下应积极推进农历新年文化形式的与时俱进,以文化升级弥补当前“年味”的缺失。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揭示出,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要求已不仅限于物质生产方面,而有更多文化需要乃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为“年味”向新时代的转化与升级指出了方向。横向来看,中华大地上有非常多样的农历新年特色文化,文化的地域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不必始终拘泥于固守自己所在局部地区的农历新年文化形式,而在当今时代的物质与科技条件下完全可以更多了解其他地区的文化形式,为我们对“年味”的印象因开放而更加丰富多彩。纵向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实际上许多独到的文化内涵并不被当今的人们所普遍了解。以学术界、教育界、媒体界带头的社会各界应积极发掘并推广农历新年相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集思广益、推陈出新,让人民群众能有更多样、更鲜活、更切身的方式体悟文化。同时,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产业,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更丰富的文化消费形式能够带动全社会的消费升级,为中国社会经济复苏添砖加瓦。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8],农历新年的“年味”也应在物质生活升级和文化生活升级两方面相协调,从而挽救“年味”逐渐消失的局面,立足于现代化的中国。

社会和谐问题则处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交界之处。在现代社会,争分夺秒追求积累和增殖的资本将竞争这一常用且高效的生产关系工具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竞争包括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3]286},劳动者常因害怕完全丢掉自己的工作而被迫接受工作时间延长,或者也

常因自身尚有余力而主动自愿延长工作时间以赚取三倍加班工资等额外薪酬，这都导致另一部分劳动者的工作机会被剥夺，于是劳动者们不得不相互竞争。竞争还包括资本之间的竞争：资本在通过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进行积累的同时，还会通过“资本家剥夺资本家”“许多小资本转化为少数大资本”^{[3]281}的积聚来相互吞并，

“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3]267}，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实际上也远远谈不上自由，而随时处于来自其他资本压力的竞争危机之中。这使得看似和平的社会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相互竞争的人们因直接的利益矛盾而愈发相互敌视，从根本上无法和谐共处。传统社会“以和为贵”的社会关系随着生产关系的异化而异化成为人与人到处敌对、纷争的恶性社会关系，“年味”也愈发成了徒有其表的虚假“和气”，丧失了内在本质的社会和谐。要消除源于交换环节的异化，就要使力图生产交换价值的社会——包括社会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等等方面对人的教育、引导和塑造——向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转化，这就只有消灭交换本身才能实现。之所以需要交换是由于分工的存在，要消灭交换必须消灭分工。之所以需要分工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为低下，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由此也延伸出专门运用上层建筑手段维护生产关系的分工，要消灭分工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改革发展新型生产关系实时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生成异化的逻辑序列虽然有服务于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的必要性，但人们不应盲目陷入对自我价值怀疑的焦虑情绪或对他人的仇恨情绪，而应当认清现实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135}的本质，适度地、有针对性地运用这些暂时性的历史要素，使其作用于它们原本的历史目的。

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向度是共产主义，对扬弃人的异化的终极解答也是共产主义；“年味”是无数中国人在不美好的现实日常生活里努力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异化的抗争和呐喊——因而，我们有必要在共产主义视域中探讨“年味”的消失与挽救。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充分发

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性革除现代社会的弊病，人民生活水平需要切实的量的提升和质的改变，唯此，才能从人的本质、人的发展、人的社会关系意义上找到埋没“年味”的症结与美好生活的出路。我们不仅要让传统“年味”回归，更要把其中美好生活的本质进一步解放出来，让原本在较短节日时间集中展现的美好生活更为长久。“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421}如果说“年味”在现代社会的异化作用下被动地消失，那么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受到主动的“革命”。

现代社会消解了传统的家庭关系共同体，人的交往关系受到异化。中国传统家庭关系于社会而言地位甚高源自儒家以孝亲为核心从而推广仁德的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意识形态，而现代社会中“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2]403}。不断改革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将使“年味”在较小格局的意义上受到消解，而在更大格局的意义上获得重塑——社会主义以无产阶级社会共同体消除异化，“年味”将由传统家庭共同体逐渐过渡、扩展至社会共同体，人们将愈发与他们的无产阶级同志情同手足；大多数人的血缘家庭关系与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阶级地位是同一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同时也能够兼容大多数人的血缘家庭关系。最终，“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得到“真正解决”^{[9]185}。在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将超越国家共同体，包括“年味”在内的种种民族文化将获得新的出路。从空间维度来看，普遍性包含于特殊性，民族的文化就是世界的文化。在共产主义视域中，民族的精神文化产物将逐渐突破自身的民族性而确证自己的世界性。新中国让农历新年的“年味”从汉族走向中华民族，全球华人华侨又让“年味”走向全世界，这便表现为“年味”的扬弃过程；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会将文化从民族的局限性中彻底解放出来，从而完全成为世界的文化。从时间维度来看，“年味”既是美好的，但同时又是一种束缚；它既体现为一种美好生活的景观，但实际又将美好生活限制在了节日的有限时间。

对“年味”的扬弃进而也是对人的异化的扬弃——既包含了对美好生活的肯定向度，又包含了对资本逻辑的否定向度。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种限制社会中大多数人在一段有限时间内感受美好生活和优秀文化的“年味”将被消灭；而作为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的联合体中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喜好来体验的“年味”将永存，在这种意义上，“年味”消失的哲学本质是人民群众由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一种体现，是美好生活真正而彻底的实现。美好生活不消灭人民群众，就不能成为人人可自由享受的普遍现实，人民群众不把普遍的美好生活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2024(11)：4-8.
- [7]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
- [8] 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J]. 求是，2023(16)：4-8.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作者简介：贺胤杰（1999—），男，汉族，山西太原人，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